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七七期 ——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811d)

---

【国史论衡】	新瓶里的旧酒	
	——新书《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的旧思维	余汝信
【史海钩沉】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的“四三派”和“四四派”	卜伟华
【读书笔记】	一代革命者的心理肖像	董国强
【书刊介绍】	质疑成说 可圈可点	
	——读史云、李丹慧新著《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	丁 东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国史论衡】

新瓶里的旧酒  
——新书《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的旧思维

• 余汝信 •

据说，余英时对不久前面世的香港中文大学编年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十卷本，已出六卷，尚有四卷据称即将出版），有如下评价：“这是到现在为止，一部规模最宏大、叙事最详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每卷都达到了史学著作的世界水平。作者不但一律以中俄档案、回忆录、口述历史等为基本原料，而且也大量地参考了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不但如此，每位作者都以批判的态度检查史料，对于史料中互相冲突的记载，详加考订，以建立最可信的史实。”（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网页 <http://www.chineseupress.com>）笔者对余说中省略号前的小半段不表异议，却对省略号后的大半段不敢认同。

以多位学者推崇的、描述1972年至1976年的中国的第八卷《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史云、李丹慧合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为例（以下简称为《难》），笔者认为，虽然该卷作者对此一时期的某些个

别事件有独到的见解，但全书的体例并未突破大陆官方党史教科书的窠臼，观点上往往囿于旧说而带有较多官方范式的痕迹。

例如，《难》仍存在着“文革前期沆瀣一气的林彪、江青两个野心家集团”（《难》392页）这样旧有的提法，说明作者仍然摆脱不了“林彪、江青犯罪，毛泽东犯错”的官方说教。“林彪野心家集团”存不存在姑且勿论，历史上难道存在过一个“江青野心家集团”吗？没有！毛泽东与江青在政治上是不可分割的，要就只有“毛江集团”，断然没有一个可与毛分离的“江青集团”。

又例如，《难》称，1972年7月毛泽东在他召集的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上批评了“四人帮”。作者虽然也承认毛的所谓批评“无论从语气还是内容，都说不上严厉”，却又称“但是，这一系列对江青的批评，毕竟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对江青的一些反感甚至渐生厌恶。”（《难》383页）熟悉文革史的研究者都知道，此类“批评”与其说是批评，毋宁说是对其政治斗争手腕、策略的教诲。毛从不涉及对江青激进的极左思想体系的批评，因为从思想体系上来说毛江本来就是一家。毛晚年在生理上可能不需要江充当妻子的角色，却从未有证据表明毛在政治上厌恶他的这位学生兼战友。

再例如，《难》称，毛“他还认可了江青批判周恩来和批林批孔的做法。”（《难》383页）作者将主次关系大大颠倒了。难道批林批孔批周的发起人不是毛泽东而是江青？该书还称，毛泽东告诫纪登奎“你那里当心，不要变成五人帮了。”（《难》383页）其实，“四人帮”早就是“五人帮”了。惟那另一位还轮不到纪登奎，而恰恰是毛泽东本人。毛是“五人帮”中领头的。

《难》称，“1972年后毛泽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情变化”（笔者注：指该书作者自认为的“毛对江青的一些反感甚至渐生厌恶”），“只能从江青个人方面去找原因。虽然至今我们没有找到有说服力的证明，但‘红都女皇’事件也许是一个解释。”（《难》383页）

所谓“红都女皇”事件果真验证了“毛对江青的一些反感甚至渐生厌恶”吗？让我们就该书“‘红都女皇’之谜”一节，沿着《难》的作者给出的思路作些剖析，顺带的，也分析一下《难》的作者在史料运用方面的一些失误。

1、据维特克在她1977年出版的《江青同志》一书中说，是中国驻外机构建议她“为什么不考虑研究年轻的妇女同志，特别是那些近几年提拔到中央委员会的女同志？还问我是否介意她和高粱代表我给北京写一封信，说我请求访问中国，研究革命的女性和文化？”（《难》384页）

这段话，《难》的作者虽然有一个脚注称是引自《江青同志》英文版原著，但有理由相信是转引自笔者2004年的《维特克访华与〈江青同志〉》一文。原因是文中的“高粱”应为“高梁”，笔者的笔误《难》的作者原文照抄了。更应指出的是，建议维特克访华的不是一整个“中国驻外机构”，而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黄华大使的夫人何理良。《江青同志》的原文相信更能使人明白维特克访华的来龙去脉：“我谈到江青在国外令人反感的形象使何理良引起注意并感到愤怒。她承认江青是一个有独创性的革命者，但是说我不应该老是纠缠她的过去。我为什么不考虑研究年轻的妇女同志，特别是那些近几年提拔到中央委员会的女同志？还问我是否介意她和高粱（笔者注：应为高梁）代表我给北京写一封信，说我请求访问中国，研究革命的女性和文化？她还说只有我亲眼到这个国家看看，同人民群众直接对话，才能避免以国外图书馆里一些错误的，或是不令人满意的文献为基础进行‘学术性’写作的缺陷。”（见拙稿《维特克访华与〈江青同志〉》，首发于电子杂志《枫华园》2004年4月30日总第448期）

2、在北京，维特克顺利地采访到了邓颖超、康克清等人。对外友协将报告呈送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8月10日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难》384页）

对外友协什么报告？《难》的作者缺乏交待。实情是，对外友协陪同人员在一份简报中反映了维特克一再表示希望见江青的要求，周恩来办公室人员看后嘱外交部通知对外友协正式写一报告。周于8月10日将报告批给江青：“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周还批道：“在你尚在北戴河时，已请邓颖超、康克清两同志见她，谈谈长征。蔡大姐因身体不好，尚在北戴河，不拟见了。”（见丁雪松口述、杨德华整理《丁雪松回忆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本文引自该书电子版<http://www.shuku.net/novels/zhuanjia/nds/nds.html>）

在周恩来将报告批给江青之前，刚从北戴河回京的江青根本不知道有维特克此人。报告一批，周恩来完成了江青与维特克之间牵线人的角色。周的这一举动完全是向江示好的表现，这一动作更说明，在1972年，周与江的关系是密切、良好的。

3、8月12日下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受了维特克的采访。陪同江青的还有姚文元、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张颖女士等人。（《难》384页）

虽然维特克和张颖在其回忆中均称王海容在场（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第一版20页），但据更权威的会见当日的新华社电讯，参加会见的是两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姚文元，对外友协秘书长丁雪松，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颖，以及单达圻、陈明仙、沈若芸、徐尔维和于世莲，并没有提及王海容（新华社1972年8月12日讯；《人民日报》1972年8月13日第二版）。《人民日报》以及《江青同志》英文版原著所附的会见照片中也没有王海容。此外，王、张两人的职务在《难》的叙述中也有误，王当时是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如前所述为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

4、江青十分兴奋地说了很多关于自己个人历史的内容，表现出希望维特克为她写传的强烈欲望：

关于我个人的历史，我的革命斗争史，我都可以对你谈。唔，还有不少罗曼蒂克的意思呢。

我们合作吧，我提供你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30年代写过毛泽东，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难》384页）

后两段话，《难》一书引自张颖的“实录”。（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22—24页）问题是张颖称当年“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同上书163页）“江青把封存在外交部的所有记录材料都搬走，而且烧毁了。”（同上书167页）那末，二十多年后“实录”中这些谈话“记录”又从何而来？凭过人的记忆还是凭想象？

反之，今天我们已可阅读到维特克的英文原著（她有中方给她的前半部分谈话记录和她自己全部的英文速记稿）和中译本（罗克珊·维特克著、范思译《红都女皇——江青同志》，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第一版），为什么还要引用张颖这些不可靠的、带有强烈倾向性的材料？

张颖的不可靠在于，其一，江青要塑造的，是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形象，这一形象身上怎么允许带有小资产阶级的罗曼蒂克成份？

其二，根据维特克的版本，有关斯诺及其夫人一段是，江青她转到另外一个话题，她说周总理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建议她应该接见哪些外国客人。当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1970年9月来北京访问的时候，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安排接待工作。通知江青参加接待的时候，她正在小睡。因为没有任何提前的通知，她一时不知道应该送给尊贵的客人一份什么样的合适礼物。而在斯诺夫人这一边，她也被弄得有些混乱，结果意外地把本来准备送给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礼物送给了江青。

“‘你见过斯诺夫妇吗？’她问道。

“虽然曾经读过很多斯诺写的书和文章，我没有见过他们，对于他的作品我们只聊了几句。然而，我和他的前妻奈·威尔士有联系，她曾经在1930年代末期采访过中国的女性革命领导人。

“‘他现在的妻子对中国也非常友好。如果你见到她，请转达我对她和她的家人的问候以及欢迎她再次来访。你成为中国的朋友后，你也可以经常来看看我们。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接待你。’”（《维特克访华与〈江青同志〉》）

这里，没有什么“一举成名”、“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等等。维特克记录的，是当时处处显示自己革命化的江青，而张颖笔下的，是被脸谱化的江青。

5、维特克受宠若惊，立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江青还宴请维氏并到北京护国寺人民剧场观看样板戏《红灯记》。当天一直谈到晚上11时。江青还与维特克约定，在广州继续进行采访。（《难》384页）

据维特克的版本，看戏的地方是在天桥剧场，不过这无关宏旨，重要的是，江青当晚与维特克约定在“广州继续进行采访”却是《难》的作者自己的创作。维特克是8月24日在上海采访期间才突然被告之江青要再见她的。8月12日晚告别时，江青只是告知维特克，此次会见的谈话她可以发表，不过“首先我必须请总理查看我们会晤的记录。”对于维特克问江是否会再讲解诸如她生活的其他方面的试探，江最后说，“这次没时间了。下次你到中国来，我们再谈。这会儿，我要给你一些纪念品，尽管我是一个摄影门外汉，我还是拍了一些照片，我要给你一些当作纪念。也许这是班门弄斧。我这会儿没带好的，我拍了一些女民兵，但‘有些人’拿走了好的。等回到中南海，我再找一找。”（罗克珊·维特克著、范思译《红都女皇——江青同志》34—35页）

6、陪同江青接待采访的张颖等人认为江青所谈内容严重出格，时间也过长，向外交部领导做了汇报，部领导无可奈何。周恩来也十分伤脑筋，连续三次召集陪同接待维特克人员开会，商议对策。针对江青要谈解放战争历史的打算，周恩来对张颖说：“不要谈什么战争。你到广州以后把我的意见立即转告江青同志，只谈文艺。再见一次就够了。”（《难》385页）

这又是《难》的作者不加分析地采用了张颖的说法。试问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之下，一位副司长级的陪同人员怎么可能向部一级领导反映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严重出格”？相反，以维特克当时的观察，张在江身边是另外一副模样，“张颖只比江青小8岁，但像大多数人一样，政治地位要低得多。在江青面前，她是个敏锐的观察者，说话总是很谨慎，……江青通过张颖这个渠道传达给我信息，她喜欢通过他们间接传达。这样，我就不会打断她的思路。张颖也传递能让我看的文件，都是有关江青后来的经历”。（罗克珊·维特克著、范思译《红都女皇——江青同志》150页）

张颖当时与江青的关系，1976年10月以后曾受到抨击，对外友协的一份报告将其划

入与江青合谋分子一边。（张颖《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169页）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张颖在25年之后要拼命洗脱自己与江青的一切干系。

至于张颖所称周恩来对江青谈话的范围、时间限制，事实上维特克8月12日与江青见面之后，又与“邓颖超和其他妇女领导干部”讨论了四个上午。（罗克珊·维特克著、范思译《红都女皇——江青同志》35页）为什么周恩来对自己的妻子可以不加限制而对江青则限制“只谈文艺”而且“再见一次就够了”？张颖这些说法可信吗？

7、在总计长达六十多小时的六次采访中，江青几乎毫无保留地向维特克讲述了自己的历史，吹嘘自己在陕北和毛泽东一起指挥解放战争，并且把抗美援朝战争等军事地图和中央有关部门的内部文件提供给维特克使用，要翻译和接待人员把全部录音整理成文字送给维特克写传用。（《难》385页）

实事求是地说，江青只是说自己在陕北作为妻子与丈夫一起转移，并没有“吹嘘”自己和毛“一起指挥解放战争”，转移行动与指挥作战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江青向维特克提供的地图，只是25年前在陕北的“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图”，并没有什么“抗美援朝战争等军事地图”。所谓“中央有关部门的内部文件”，只是诸如江青召集的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等，类似“文件”，早已于1967年间在报刊上公开披露过。

8、说到在上海的生活，江青还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上海小调：“我呀我的妹妹哩，舍呀舍不得离……哟呵呀呵唉……哈哈，哈哈。”江青娇笑着说：“有意思，是不是？”

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了。喏，就是追逐我的人，我都可以数出名字来，他们还使用各种手段哩。以后都成了知名人士，现在又被打倒了。哈哈，还是不说他们吧。有趣的一次，是你们美国人，是一个水兵，也许是喝醉了，摇摇摆摆在上海外滩走着，向我迎面走来，他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路，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两脚一并，咔嚓一声。我回头想走开，那家伙嬉皮笑脸向我走近来，双手也伸过来了，哼，想占便宜！我抬手就给他一巴掌。他还是笑嘻嘻，又是咔嚓一声，敬了个军礼，还说对不起呢。你们美国人，还是懂礼貌的……（《难》386页）

《难》转引自张颖“实录”的以上一段，已经远不是什么“实录”，而是对历史的演义了。问题是作为严肃的历史著作，为什么会引用这么一些一般研究者都不屑一顾的演义式、脸谱化的材料呢？

根据维特克的说法，江青在回忆上海时期的经历时，完全没有这么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江青对在上海岁月的回忆，揭示了外国人与中国人、穷人与富人、反动分子与激进分子、投降派与爱国者之间的对立，即财富和权力不平等的极端对立。对于像她这样的被压迫者来说，生活是痛苦的”。（罗克珊·维特克著 范思译《红都女皇——江青同志》93页）

不要忘记，江青当时极力要维护的，是一副彻底的革命者的形象。维特克说：“1930年代的上海艺术团体盛行，江青宣称加入了左翼联盟。左翼联盟的作用包括保护艺术家免受国民党对异端书籍的粗暴审查、对先锋艺术的破坏、对革新电影的镇压、对自由教育的限制”。“在1935年农历新年被释放后，江青很快恢复了演艺生涯。她说，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真正的喝彩。几个左翼团体都秘密派人与她接头，建立关系。尽管她尚未成为办过正式手续的有充分资格的共产党员，但左翼团体承认她是一个革命者。……他们一定已经认识到，不论她曾经参加的戏剧、电影和其他活动看起来是多少平淡无味，但在本质上都是革命的”。（罗克珊·维特克著 范思译《红都女皇——江青同志》98页）

9、此事到此已经基本结束。然而，1973年香港有人写了一本《〈红都女皇〉以吹捧形式影

射江青。流入大陆后，社会上传说就是维特克利用采访写的，引起轩然大波。……

王年一文章认为，《红都女皇》这本书出版和林彪军人集团有极大的关系。

1969年5月17日，江青把黄、吴、李、邱和姚文元、李德生找来，谈了一个上午，攻击周恩来，大吹毛泽东在延安如何追求她。……黄、吴、李、邱听后十分反感，回来报告林彪，林要他们立即报告毛泽东。但毛听后并无反应，却要他们保密。随后黄、吴、李、邱又报告了周恩来。

王年一文章认为，这是第一次涉及毛泽东婚姻家庭这个敏感问题，而且又是江青与维特克谈话之前的惟一一次泄露。这次泄露得知内情的只有林彪和周恩来。周绝对不会借此向江青发难，这不符合周恩来一生的政治风格。因而，结论应是，黄、吴、李、邱遭拘捕后，军队有知情人将江青的历史泄露出去，进行报复。（《难》387页）

“王年一的文章”，指署名王年一、吴润生的《江青的一次讲话与〈红都女皇〉》，原载《文史精华》2002年第3期，《难》引用的是《老年教育》2002年第7期转载并改了标题的《〈红都女皇〉究竟泄了什么密》。这是以王年一名义合写的文章中最糟糕的一篇，据笔者了解，此文真正的作者并非王而是吴。

《难》和王、吴文都肯定了1973年（《难》的说法）或1975年（王、吴文说法）香港有人（王、吴文指称是女作家）写了一本《红都女皇》。而据笔者多年的考查，《红都女皇》一书只是一种传闻，没有人能说出这本书的作者、出版者，没有人能讲清它对江青究竟是褒还是贬，查遍香港大小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也没有这本书的踪影。

王、吴文称，《红都女皇》是“第一次”涉及毛泽东婚姻家庭这个敏感问题。错！斯诺前妻海伦·斯诺（尼姆·韦尔斯）1930年代出版的《红色中国内幕》（《续西行漫记》）早已涉及此一题目。文革期间在香港出版的丁望著《江青简传》（香港：当代中国研究所1967年9月第一版）、钟华敏著《江青正传》（香港：友联研究所1967年11月初版），都涉及毛的几次婚姻经过（如《江青正传》涉及毛、江之恋的有西北行，往延安，“鲁艺”教话剧，徐、蓝之恋，初见毛泽东，窑洞藏娇，飞上枝头，未见凤凰等章节）。

1974年10月，台湾出版了一本《江青外传》（老龙著，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民国六十三年十月初版），这是与《红都女皇》传闻最接近的一本书。全书为章回演义体，涉及毛、江延安时期婚姻关系的共五回，即“一四、红罗帐里假戏真做，到处碰壁逼上延安；一五、窑洞里怪人故事多，礼拜六四郎探母了；一六、茫茫前路求救康生，鲁艺鬼混徐蓝热恋；一七、康生定计铺杏花路，飞上枝头想作凤凰；一八、暗里偷欢身怀孽种，改名易姓正式同居”。该书为海外文人搜集资料所作（这些资料自1930年代起在国统区及海外就很多），与大陆境内任何人及维特克都毫无干系。

《红都女皇》本身已属传闻，王、吴文却认定传闻中的这本书与“林彪军人集团”（王、吴原文是“林彪的‘军中派’”）“有极大的关系”，更是一种毫无事实依据的主观臆度。既然毛的婚姻问题自1930年代起已广泛传播于海外（只是建国后铁幕里的大陆百姓被蒙在鼓里），即使有如《江青外传》这样的一本《红都女皇》，与四五年前江青一次极小范围内的谈话及已失势的“林彪的‘军中派’”又有何相干？（王、吴的原文更主观臆断“倒台后的他们还会通过亲朋好友向香港有关人士透露江青1969年5月17日讲话的内容，指使人写这本《红都女皇》”）黄吴李邱已被隔离关押多年，他们子女的政治待遇连普通百姓都不如，又有什么能量、有什么必要指使人写这本《红都女皇》？（何况据《难》说这本书还是吹捧江青的！）这样的主观臆断与科学的历史研究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10、《红都女皇》事件当时在社会上不胫而走，沸沸扬扬，但中央是否有处理，始终是个谜。

研究“文革”的权威专家，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教授范硕少将在他的著作《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中记载说：后来中央决定，让一位外交人员不惜用巨金买下版权，把这本书送回国内。毛泽东看了后非常气愤，挥笔写道：“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范书还说，周恩来看到毛泽东不过是在气头上，并没有下定处理江青的决心，只好“暂缓执行”。这一批示后来被其他一些著作转引，范氏坚持自己曾经看到过毛的批示。但是《周恩来年谱》等书中并无只字。（《难》387—388页）

既然《红都女皇》只是一个传闻，“中央”如何处理？惟自此《难》作者的思维却游走在“有处理”与“无处理”之间，最后的结论竟然是“有处理”！

《难》引述的范硕一书就是“有处理”的典型。

范说的不惜用巨金买下的是哪一本书的版权？《红都女皇》的版权吗？这本书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向谁买版权？《江青同志》的版权吗？《江青同志》已经出版，还买什么版权？且《江青同志》1977年出版之时，毛泽东已于前一年去世，如何会“看了非常气愤”，还“挥笔”写下一段批江文字？可见，“非常气愤”与那批江的一段话，都是毛发动“批林批孔批周公”后受压抑已久的老百姓编派出来的“政治谣言”，愿望是良好的，事实是不存在的。

有关《江青同志》的版权问题，笔者在2004年的文章里引述过维特克本人的说法，这里不妨重抄一遍：“这些不可预料的内幕更加坚定了我采用江青提供的大量口述材料的决心。这本书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对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保密，而且他们显然从北京知道了一些我和江青谈话的主要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此的焦虑也与日剧增。终于，1974年1月，何理良（她那时刚在北京呆了三个月）再次敦促我不要出版一本完全是传记形式的书，或我喜欢的称呼‘江青同志眼中的革命史’。她问我是否还记得‘五月公告’（1973年5月她和黄华警告我不要写传记），同时提出只要我答应他们的要求可以给我金钱奖励。我自然是拒绝了。出于对江青本来的愿望和对历史的尊重，我认为这些独特的记录不应该被埋藏起来，所以我继续准备我的出版计划。”（《维特克访华与〈江青同志〉》）

11、这时候，张去看望叶剑英，叶突然转变话题问：“江青和维特克那次事情怎样结束的？”张告诉他江青把外交部封存的所有记录材料都搬走了，而且烧毁了。叶只自语说：“这事有蹊跷。”由此看来，这时在中央还没有就江青见维特克一事做出正式处理，至少在政治局范围内没有，因为连叶也不知道详情。据笔者所知，许多当时的政治局委员“文革”后也表示不知道毛泽东对此事有否批示。（《难》388页）

以上一段，《难》作者的钟摆摆到了“无处理”处。但很快，在下一段又摆回了“有处理”处。

12、但是，也有些记载认为当时中央确实有强烈反应。朱德的孙子在回忆录中说：

有一天，爷爷的秘书送来一封给爷爷的信，打开一看，是反映江青问题的。江青在1972年8月下旬曾经接见过一位美国女学者维特克，谈了一个星期，吹嘘自己，于是，就有了根据维特克这次采访出版的书《红都女皇》，在世界上影响很不好。

爷爷看了信，感到问题性质严重，江青胡乱说话，影响竟然跑到国外去了。因为她是主席夫人，颐指气使，谁也不敢惹她，所以才把问题反映到这里来。爷爷觉得不能把问题压下来，就划了圈，写了：此事重大，须慎重处理，并报送主席。

据说，毛泽东看了《红都女皇》，气愤难抑，写了对江青的批示“分道扬镳，撵出政治局……”

此说虽然把《红都女皇》与维特克采访混为一谈，但确也说明了中央领导人中当时有人反映此事。购买维特克版权一事，也有雪泥鸿爪可寻。（《难》388—389页）

朱德孙子的这段回忆，明显是事后编造的“伪回忆”。其一，迄今为止没有实物证明曾经有过《红都女皇》这本书；其二，正如《难》的作者自己所说，将传闻中的《红都女皇》与维特克采访混为一谈；其三，既然无法证明有《红都女皇》一书，维特克的《江青同志》出版时毛又已经逝世，何以能“气愤难抑”；其四，毛、江思想体系是一致的，可能以毛的标准来衡量，江青的谈话并无大碍，又何来“气愤难抑”？其五，朱德在整个文革期间都只是一个摆设，未有任何政治上的影响力和实质性的权力，谁会向他反映江青的“问题”？退一步说，如确有反映，朱德有能力处理吗？他敢向毛“报送”吗？他敢惹江青吗？《难》的作者以朱德孙子这种“伪回忆”企图“确也说明中央领导人当时有人反映此事。购买维特克版权一事，也有雪泥鸿爪可寻”，只能说明作者对史料的判断力出了大问题。

13、粉碎“四人帮”一周后的1976年10月12日，华国锋、叶剑英等接见上海马天水等人时，华国锋在讲话中历数江青罪状曾说：

江青和美国女作家维特克谈话，谈了六次，贬低主席，内容下流。“四人帮”逼着外交部交出，特别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亲自写信，找乔冠华把材料要回来。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说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难》389页）

华国锋这段话政治色彩甚浓以致罔顾事实。客观地说，维特克是周恩来引见给江青的，不管江青与其谈了多少次，都不能算是“罪状”。江青的谈话并没有贬低毛，也并无什么下流之处（充其量只是“左”得惊人）。所谓“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说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看来也没有付诸实行。《江青同志》的版权（包括中、英文版权）至今一直在维特克手上。《江青同志》近年在香港出过中文版，也不见得有个中方机构进行过干预（相反维特克曾问过了一下）。

14、综上所述，我们虽然不能完全解开《红都女皇》之谜，但也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分析：1972年江青在接受维特克采访时说了很多极不得体的话，特别是有关毛泽东在延安的私生活，影响很坏。但当时因为记录稿没有传出去，并没有立即产生风波。而1973年以后香港《红都女皇》的出版，成为导火索，中央有人联系起来向毛反映。可能在很小的范围，比如、毛、周、江之间，有过内部处理。

至于毛的那段“立即撵出政治局”批示，为什么没有在粉碎“四人帮”时作为最有力的尚方宝剑公布？仍然是个谜。（《难》390页）

通过以上“基本分析”，《难》的作者又坐实了“可能……有过内部处理”的说法。

惟笔者认为，周恩来将维特克引见给江青，反映了“九一三事件”之后至1972年间毛、江、周之间紧密而良好的关系。江青会见维特克时的谈话，通篇反映了其极端革命的、极左的激进派思维，并非是得体不得体的问题。而引起最大争议的有关毛在延安时期婚姻问题一节，江的本意是驳斥外间的“胡说八道”和“恶意诽谤”，如有关贺子珍与毛的关系，江强调是贺挑起离婚而不是毛，这些都是为了维护毛，而绝非贬低毛的形象。

然而，1973年中毛利用江等激进派发起批林批孔及至1974年反复辟回潮，尤其是1973年冬在外事领域对周恩来进行无理批评后，引致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的不解与不满。在外事系统内拖延以至中止了对维特克所需材料的提供甚至劝其不要出版江青的传记，都是这种不满的一些体现。而《红都女皇》的传闻，更是这种不满的一种发泄。所谓毛对江的批示，实质上只是不满的人们编造出来的期冀，这就从根本上解释了这一政治流言为什么不是一把《难》的作者想象中的“尚方宝剑”，因为，它仅仅只是流言而已。



15、尽管如此，可以想见，当毛看到江青的信口开河、肆无忌惮谈话记录，并联系起《红都女皇》的恶劣影响，心中肯定怒火中烧。毛泽东过去就对江青的作风和为人颇多不满，只是由于晚年发动“文革”的政治需要，才信用支持江青和容忍了她的一些做法。“文革”后期，这种需要逐渐淡化，仅仅成为维护一种形象了。因为，江青是文化革命的一个图腾，无法割裂。这也许能够成为从1972年以后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与之疏远、但又不能下决心予以处置的一个解释。（《难》390页）

在这里，《难》的作者再次将“可以想见”之事变成为“肯定”实在之事。其实，迄今为止，我们并无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毛泽东是否得知江青见过维特克，更不清楚毛对此事表示过什么态度。该书作者有什么根据说“当毛看到江青……谈话记录”？既然《红都女皇》一书我们从未见过实物，如何得知它会影响“恶劣”？又怎么能推断毛“心中肯定怒火中烧”？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毛在重大问题上从来都是依靠江青。从文革发起阶段，1965年的批《海瑞罢官》、1966年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五一六通知”的产生过程均可见一斑。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更说明毛对江青的信任度超越了他党内的任何一位“朋友”（包括林彪、周恩来）。即使在文革后期，1973年的批林批孔批周公，1974年的儒法斗争讨论和反复辟回潮，1975年的评《水浒》批投降派，1976年的反击左倾翻案风，哪一桩能离得开江青？这种政治上的需要又何曾淡化过？文化大革命的图腾绝不仅仅是江青，而是毛泽东和江青！企图在毛、江之间找到政治上的嫌隙和裂缝，恐怕永远是白费力气、徒劳无益的。

2008年10月

~~~~~

## 【史海钩沉】

###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的“四三派”和“四四派”

• 卜伟华 •

“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中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天派”和“地派”，在中等学校（即普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中也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四三派”和“四四派”。“四三派”与“四四派”的矛盾和斗争是北京中学“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北京红卫兵运动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图根据现有的一些资料，对北京中学的“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历史情况进行一些介绍和分析，错漏不当之处，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 一、“四三派”、“四四派”的形成

北京的红卫兵运动是从中学开始的，但在1966年10月以后，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开始逐渐取代中学红卫兵成为北京红卫兵运动的主角。在北京市的各中等学校内，在“八·一八”前后成立的、以“红五类”为主体的红卫兵（俗称“老红卫兵”）与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崛起的造反派红卫兵之间的斗争虽然也一直在进行着，但多局限于学校内部，对社会上影响不大。在1967年1月开始的“全面夺权”运动中，北京各高等院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普遍都卷入其中，中学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一般只在校内夺权，参预社会上夺权的并不多见。

1967年春，在经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镇压“联动”（1）以后，北京中学的

“老红卫兵”在学校中的主导地位已经普遍被造反派红卫兵所取代。

3月7日，毛泽东对《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批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从3月初开始，北京卫戍区派出15000多名指战员，对北京市的329所中学和9所大学的31万师生进行了军政训练。按照中共中央的通知，政治训练的主要内容是学习毛泽东的一些文章以及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和文件，有些学生也可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军事训练的内容主要是队列训练，训练地点在本校。

从总体上说，军训将人民解放军的组织性、纪律性灌注于学校工作，灌注于青年学生，对稳定学校秩序，防止更大的混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人民解放军的积极参与，使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的教学工作在一些学校开始恢复。但是，军训又不可避免地将“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贯彻到学校工作中去，同时，缺乏学校管理经验和教学经验的军队干部将军队工作经验生硬地移植于学校，用带兵教兵的方法对待青年学生，往往不得要领，尤其是面对着以造反为旗帜的红卫兵，更是力不从心。军训的作用只是在形式上对红卫兵运动加以一定的约束。而这种约束对已经步入青年阶段的大学生来说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但对还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来说，多少还有一定的作用。

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在军训中始终强调红卫兵要整风，加强组织纪律性，克服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曾经风行一时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受到批判。为了解决中学里的“老红卫兵”与造反派红卫兵之间、各造反派红卫兵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一些中学的军训团采取了解散红卫兵组织的做法。这引起了中学造反派红卫兵的强烈不满，并将意见反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那里。

1967年4月3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接见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的学生代表。江青在讲话中指责负责北京中学军训的北京卫戍区解散中学造反派组织的做法，她说：卫戍区“很多做法不妥当，我们有责任，我们没有叫谁支持‘联动’，我希望卫戍区同志听听小将的意见，和小将不要搞崩了，要恢复壮大左派，以左派为核心，以‘联动’为核心怎么行呀？”谢富治说：“要把‘联动’搞垮，必要时把军训停下来，为支持左派服务，左派组织不能解散。这样干不行，怎么叫支持左派？‘联动’这么嚣张。”康生在讲话中对北京卫戍区负责军训工作的副司令员李钟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李钟奇3月27日的讲话是完全错误的，他的这个讲话不谈阶级斗争、不谈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邓反动路线的斗争，完全是‘联动’的观点啊！什么‘你们在座的全是高干子弟、干部子弟（除了爸爸妈妈有问题的），你们的爸爸妈妈在红军时代、抗日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很大的贡献，你们要支持他们的精神’，通篇是在摆他们父母的功，完全是‘联动’的……你站到哪个立场上去了？你们（指造反派）要带头干，不管谁说你们，你们不要怕。解放军要多看造反派的长处，可是李钟奇却说‘造反派能革命一天，老红卫兵就不要瞧不起人家’，这是什么话！”“这个讲话是‘联动’的代表作，现在‘联动’又活跃起来了，为什么老不散？就是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支持他们。”当时在场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和李钟奇不同意康生的话，当场起身辩解，被江青、陈伯达制止。

中央文革小组及谢富治等的讲话使中学里一度受挫的那部分造反派大受鼓舞，并激起了他们对军训团自军训以来就存在的不满情绪。过去就因为怕被别人扣上“反对解放军”的帽子，他们大多不敢公开对军训团和卫戍区进行对抗，现在有了“中央首长”讲话的尚方宝剑，他们便觉得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抗争了。北京街头很快就出现了批评军训团和卫戍区的大字报，有的大字报和大标语还直接点名批判李钟奇。

4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见中学造反派。他们讲话的主旨还是说解放军应当坚决支持造反派，但也批评了给军训团和卫戍区贴大字报的做法，王力在讲话中说：“关于班级大联合问题，是毛主席的号召，这个号召是最高指示，是正确的，要执行，问题出在执行这一指示，有执行好的，也有执行不好的，要看主流，全局好的，当然也不是没有问题。也确有一些不太好的，主要是根据学校里左派处在什么地位，在什么条件下进行大联合。军队同志的缺点、错误，一定要采取适当方法，不要公开提。关于军训要总结经验，即使军队的同志支持错了也要给他们提供情况，让他们改，改了就行了。‘揪出李钟奇’这个口号不好，要改掉，要爱护卫戍区，卫戍区是保卫毛主席的，不能把他们搞臭。”当天晚上，江青在接见“红代会”代表时也要求把给李钟奇贴的大字报覆盖上。中央文革小组的这些讲话又给中学里支持军训团的那部分造反派红卫兵以很大的鼓舞，他们更加坚定地认为支持军训团没错，搞以班级为基础的大联合没错。

北京中学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中互相对立的两派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各取所需，互相指责，并由此形成公开对峙的“四三派”和“四四派”。

## 二、“四三派”与“四四派”的主要分歧

“四三派”、“四四派”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特定的形势下产生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他们身上存在许多共同点。他们的年龄基本都在13至20岁之间，他们这一代青少年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对革命领袖普遍存在盲目的崇拜和迷信，阶级斗争观念都很强，对“文化大革命”的“左”的理论一般都比较容易接受。但由于这两派组织的成员特点和经历的差别，他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又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从当时的大字报、小报、传单中看，“四三派”与“四四派”的主要分歧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

1、如何看待军训。“四三派”认为军训团没有坚决支持左派，在对待“联动”问题上有“右倾”，解散造反派组织的做法是错误的。而“四四派”则认为军训团已经坚决支持了左派，军训团在军训中的各种做法是正确的，军训好得很。

2、如何看待“联动”和“老红卫兵”。“四三派”认为“联动”是反动组织，对“联动”必须彻底砸烂，对有“联动”思想的“老红卫兵”组织也必须进行严肃地批判和斗争。而“四四派”虽然也认为“联动”是反动组织，但他们认为参加了“联动”组织的大多数成员是认识问题，是可以教育和转变的。对有“联动”思想的“老红卫兵”组织绝大多数是应该团结争取的，是可以参加大联合的。

3、如何看待中学“红代会”。1967年3月25日，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中学“红代会”）宣告成立。4月份以后，在中学“红代会”中，也分为“四三派”和“四四派”两大派。由于在“红代会”中“四四派”占大多数，“四三派”认为中学“红代会”中没有以左派为核心，在吸收各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加入“红代会”的问题上排斥了大批造反派组织，认为中学“红代会”必须进行彻底改组。而“四四派”认为中学“红代会”是经过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准的，是全市中学红卫兵组织的代表，即使有缺点错误也只能补台不能拆台。

从两派的组织构成来看，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在“四三派”中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所谓社会关系复杂的人数较多一些。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经存在的“左”的“阶级路线”使过去的剥削阶级成员及其家庭饱受折磨，很多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文化大革命”初起

时，大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学生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和压制，他们希望通过“造反”改变自己的境遇的要求一般都比较强烈，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行为也较为激烈。《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2）一文则反映了“四三派”学生中最极端的一小部分人的思想状况。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称“四三派”是“对再分配有最激进要求的那一部分人”，由此断言“四三思潮也就代表了一种与历史发展紧紧相扣的生气勃勃的新思潮。它与反动的抵制再分配的联动思潮水火不相容，并以最激进最彻底的姿态投入战斗，它是最令特权人物感到恐惧的势力。”

总的来说，“四三派”和“四四派”都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中学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它们都毫无保留地响应毛泽东号召，听从中央文革小组的号令，是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中学中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要依靠力量。这两派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上并无本质的区别，除了在关于军训和军训团，关于北京市中学红代会等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外，它们的指导思想、斗争方向和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都是一致的，这两大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都是应该否定的。

“四四派”在组织数量和人员总数上都比“四三派”多（3），在中学“红代会”中占据主流地位。“四四派”的许多活动也是依托“红代会”进行。而“四三派”则属于非主流派。在“四三派”形成初期，其内部组织联系比较松散，观点也不统一。1967年4月下旬，“四三派”内部出现较大分歧，一派以西城区的二十八中、三十一中、女八中等学校为中心，一派以师大二附中、电校、邮校、一一〇中为代表。前者认为对中学“红代会”不能拆台，只能改组，而后者则坚持采取强硬态度。后来，持比较强硬态度的“四三派”逐渐形成与中学“红代会”相抗衡的“十五区县委员会”（4）。

“四三派”虽然人数比“四四派”少得多，但它活动能量很大，在大约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始终与“四四派”相抗衡，两大派基本上保持了力量的大体平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四三派”得到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和北京一些大学造反派组织的支持。1967年4月19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等8个高校造反派组织发表了《关于目前首都中学运动的声明》，表示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坚决支持中学革命造反派小将。遵照谢富治的指示，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等10所院校的造反派成立了一个中学运动调查组，共百余人。几天后，这个调查组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学运动的声明，提出：“目前‘联动’保守势力配合社会上的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把矛头指向造反派，妄图反攻倒算，挑拨革命造反派与解放军的关系，把反对解放军、反对军训的帽子扣到革命造反派头上，整革命造反派的材料”，提出前段中学大联合中存在右的错误，必须迅速纠正，表示坚决支持“中学革命造反派小将”。从措词用语上明眼人不难看出他们的基本立场是支持“四三派”的。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在对待中学两大派的态度始终是比较明确的，他对“四三派”情有独钟，多次强调中学搞大联合要以“四三派”为主（5）。1967年5月9日，清华“井冈山”、与北京体育学院“毛泽东思想兵团”800余人骑自行车进城游行，一路高呼“打倒联动！”“坚决支持中学革命造反派！”“彻底批判反动血统论！”等口号，以此表示对中学“四三派”的支持。1968年春，两派矛盾再度激化时，清华“井冈山”的一些人多次召集女一中、师大女附中、六中、四中等“四三派”头头开会，研究形势与对策（6）。

“四三派”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组织有北大附中“井冈山”、清华附中“井冈山”、一〇一“毛泽东主义公社”、六中“红旗”、二十八中“八一八红卫兵”、电校“井冈山”等。“四四派”中比较有影响的组织有二十五中“东风”、六中“新六中红旗”、清华附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电校“红旗公社”等。

### 三、“四三派”与“四四派”的斗争经历了两次大的起伏

“四三派”与“四四派”的矛盾与斗争，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经历了两次大的起伏。

第一次，从1967年4月起，两大派形成并开始在各中学展开对抗，一些中学甚至发生武斗。4月底发生在北京四中和5月初发生在北京二十八中的两次武斗事件震惊全市。两派的矛盾斗争开始公开化和尖锐化，从少数学校发展到全市的多数学校。两派的斗争也反映到中学“红代会”中。起初，“四四派”在“红代会”中占绝对多数，有不少属于“四三派”的中学造反派组织被拒之门外。随着两大派矛盾斗争的加剧，中学“红代会”开始出现分裂。从5月起，北京市各区县的“四三派”和“四四派”相继成立了派性的区县分会或分团。“四三派”要求对中学“红代会”进行改组〔7〕以改变“红代会”内的力量对比。8月发生中学“红代会”机关报纠纷。8月18日，“四三派”《中学红卫兵》报又加上《兵团战报》名义，刊登“中学红代会无产阶级革命派”〔8〕的《严正声明》，“宣布：自今日起，不承认它（指原来“四四派”的《兵团战报》）为中学红代会的机关报。”“自即日起，中学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新《兵团战报》与《中学红卫兵》联合战斗了！她将是我们的中学红代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机关报！”此后，北京中学“红代会”就有了截然对立的两份机关报。在7、8、9月这三个月里，北京极左思潮大肆泛滥，红卫兵运动出现失控，中学的“四三派”、“四四派”斗争也呈现矛盾加剧，武斗升级的严重局面，出现了几起致死人命的流血事件。10月，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纪要以后，全国混乱的局面有所缓和，北京市各中学内的派性斗争也受到了一定的抑制。在北京市革委会和北京军训总指挥部的努力下，中学“红代会”在12月下旬进行了组织机构整顿。将原来两派成立的各区县分会一律取消，两派的报纸全部取消，另办一个新的“红代会”机关报。对原来的核心组进行了扩充，使两派的力量对比相对平衡。至当年年底，两大派斗争渐趋缓和。

第二次，从1968年3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击右侧翻案风”的影响下，各地造反派的派性斗争重新抬头，北京中学“四三派”与“四四派”两派斗争也波澜再起。首先是部分学校的“四三派”组织恢复活动，北京二十二中成立“三七井冈山”，重提军训团支左支错了的话题，北京五中、二十一中等学校的“四三派”准备召开纪念“四三”一周年大会。4月，在城区的主要街道不断出现有署名“中学无产阶级革命派火炬兵团”的大字报和传单，大字报的题目有《71个为什么》、《30个为什么》、《31个为什么》和一论、二论、三论《中学运动向何处去？》等等。5月20日又贴出《组织起来——四论中学运动向何处去？》其主要论点如下：“一、我们与‘联动’和中学红代会一小撮的斗争，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二、‘四三、四四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通通是骗人的鬼话。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大抓革命造反派的头头，把革命小将（如三十一中、二十八中）打成反革命。三、我们处于无组织状态，尽管我们的文章揭露得再厉害，再深刻，没有群众也是不行的，所以必须组织起来，联合起来，一声唤！他们就要发抖！针锋相对，重新组织起来。什么拉山头啦，破坏大联合啦，都见鬼去吧！《文汇报》已指出，要发挥革命群众组织的作用。六中、五中、三十一中、四十四中、二十八中、电校、清华附中、师院附中……都树旗了。好得很！我们坚决支持！四、必须串连起来，以小联合为基础，哪怕开始只有几个人，无数的小联合的星星之火，必将蔓延为燎原的烈火。”〔9〕“四三派”的一些人在某些大学的支持下，串连了二十多个中学原来的“四三派”组织，成立了“中学运动指挥部”、“火炬兵团”等组织。他们开了一些串连会，印发传单、张贴标语，诉说“四三派”在革委会的组成、清理阶级队伍、参军和毕业分配等方面受到压制的情况。与此同时，“四四派”的一些组织也恢复了派性活动。在许多中学里，经军训团作了大量工作才形成的造反派内部的大联合出现分裂，又形成两大派对峙的局面。随着北京各大专院校派性斗争的加剧，中学两大派斗争也出现激化现象，许多中学发生了武斗事件。但较之于1967年来说，参加派性斗争和武斗的人数和规模都要小得多了。在持续几个月的争斗之后，由于面临毕业分配和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两派的斗争又逐步缓和。至1969年初，老三届的毕业生基本全部离开了学校，“四三派”、“四四派”的斗争趋于平息。

#### 四、对“四三派”和“四四派”的一些典型调查

1968年春夏之交，当沉寂数月的中学派性斗争重新抬头的时候，北京军训总指挥部对反映问题较多，原来“四三派”和“四四派”斗争比较激烈，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清华附中、一〇一中、人大附中、二十八中、六中、师大女附中、三十一中、二十七中、五中、师大一附中等10所中学进行了调查，在调查报告中所反映的一些情况和统计数字对于我们了解当时北京中学“四三派”、“四四派”的矛盾斗争的具体情况很有帮助。

在10所中学的革委会中，学生委员共110人，其中“四三派”47人，“四四派”46人，其他17人。革委会主任一般由原来学校的“革命领导干部”或军队代表（军训人员）担任，副主任一派一个。（10）可以说，在参加革委会的人数上两派是基本平衡的，但“四三派”始终认为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处于受压制的地位。这主要是因为：

一、在参军和毕业分配方面，由于“四三派”组织人数较少，而且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社会关系复杂”的人较多一些，所以参军、毕业分配去三线和生产建设兵团的，“四四派”去的较多，“四三派”去的较少。从人大附中、一〇一中、二十八中、三十一中等4所“四三派”、“四四派”人数差不多的学校来看，参军的总人数是266人，“四三派”36人（占本派人数的2.4%），“四四派”143人（占本派人数的7.9%），“老红卫兵”81人，没参加组织的6人。军训总指挥部认为，在参军问题上，“四四派”学生“有些翘尾巴，说了些不利于团结的话，特别是少数第一批红卫兵（11），借此趾高气扬，使少数‘四三派’学生政治上感到有压力”。

二、学校革委会组织学生参加保卫组、专案组和外出调查工作，也是使“四三派”感到受压抑的一个问题。据10所学校的调查，参加这些工作的两派都有，由于各个学校的具体情况不同，两派参加人数互有多少。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四三派”学生参加这些工作的就多一些，三十一中、五中“四三派”学生参加这些工作的就少些。例如五中“东方红”，在21个骨干分子中，有20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者家里被抄被斗，“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革委会的负责同志和驻校军训团的同志认为“这些人搞专案和保卫工作是不太合适的，群众对他们也不相信”。

三、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初期，10所学校中有5所揪斗了学生中的坏人，有4所揪的是“四三派”的学生，一所揪斗的是第一批红卫兵的学生。这是使“四三派”感到压力最大的一个问题。

四、在一些少数“四三派”学生反对过军训和军训团的学校，“四三派”学生与军训团在感情上疏远，有的始终存在着对立情绪。

军训总指挥部在对10所中学进行过调查后认为：“目前参加串连活动的还只是原‘四三派’中的少数人，一个学校三五个，多者十几个人，最多的20人左右，而且他们长期脱离学校，有的在本组织内也失去了威信，只要我们积极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迅速纠正我们的缺点错误，顶住大学对中学运动的干预，他们再拉起队伍重新掀起中学两派斗争是困难的。”

后来发生的情况证明，这种估计是过于乐观了。北京中学运动的形势必然受到当时整个北京市的形势和全国的形势影响。而从1968年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全国许多地区都出现了群众组织派性复发，内战再起的情况，北京各大专院校校园内也是派仗不断，武斗成风。这些都必然影响北京中学的运动。北京的许多中学后来还是发生了严重的两派斗争，武

斗也曾风行一时。

注释：

〔1〕全称是“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于1966年12月5日，1967年1月被宣布为“反动组织”。

〔2〕载于良乡电校“井冈山”主办的小报《四三战报》第一期（1967年6月11日），署名“湘江评论”。

〔3〕据北京军训总指挥部1968年5月的调查，全市“四三派”约3万多人，“四四派”约20多万人。

〔4〕原为“十一区县委员会”，由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丰台区、门头沟区、通县、房山县的“四三派”分会所组成，后扩大为十五区县委员会。

〔5〕1967年8月1日，谢富治在接见中学代表时的讲话中表达了他明显的支持“四三派”的立场。他说：“四三派是好的，是革命性很强的一派，搞两个红代会不好。四四派也是革命派，四四派软一点。四三派、四四派要联合起来，团结、争取、教育、斗争所谓老红卫兵。红代会要吸收四三派。（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李冬民插话：吸收不少了。）少了些吧，以四三派为主嘛！”

〔6〕他们的主要观点有：（1）中学运动当前许多现象不正常，解放军支持（四四）一派，压制“四三派”。（2）中学运动有黑手，要拉起队伍揪黑手。（3）现在中学军训领导不称职。（4）学校革委会应改组。据北京市军训办公室《中学情况》（1968年3月29日）

〔7〕7月10日，属于“四三派”的“中学红代会十一区县委员会”发表《联合声明》，其中提出要求：“红代会必须迅速补台”，“我们十一个委员会补选在运动中冲杀出来的真正左派进入红代会核心组3—5人，常委10—15人，委员20—30人”。

〔8〕当时各派均自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

〔9〕引自北京市革委会教育小组写的《中学情况简报》（1968年5月24日）

〔10〕在较早成立革委会的学校，有的是“四三派”掌权，有的是“四四派”掌权，后来都进行了“补台”。

〔11〕指“老红卫兵”。

□ 选自卜伟华博客

~~~~~

## 【读书笔记】

### 一代革命者的心理肖像

• 董国强 •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推出的一部学术论著，作者是受到“林彪事件”牵连的吴法宪将军的女儿金秋。由于该书的敏感题材、作者的特殊身份以及哈佛大学Elizabeth J. Perry教授的大力推介，The Culture of Power出版后立即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现在八年过去了，期间有丁凯文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金秋编辑的《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和舒云撰写的《林彪事件完全调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6）等大部头著述相继问世，该书早先独特的史料价值已经变得不甚重要，但是金秋博士的学术贡献依然不容抹杀。

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视野而言，在论述“文革”问题时，中外学者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国外学者往往从理论框架的构建出发，比较注重研究视角的创新；国内学者往往从直接经验出发，比较注重历史事实的铺陈。金秋博士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作为一个前中共高干的家庭成员，在相关史料的采集和解读方面使众多国外学者难以匹敌；另一方面，她先后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等著名中国研究学术重镇接受教育和从事研究工作，得到过 Fredric E. Wakeman、Hong Yung Lee、Roderick MacFarquhar、Elizabeth Perry 等知名学者的悉心指导，其社会科学的综合理论素养又大大高于许多国内学者。这两大优势的结合，使得 *The Culture of Power* 在众多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

作者在阐释自己的研究径路时强调，这本书侧重考察的是一些“体制外因素”——主要包括历史人物的性格品行、个人经历、社会关系等——在政治领域的作用和影响。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径路，是因为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的“人治”特性，使得一些西方通行的政治学分析框架和概念范畴——例如政治组织、意识形态、正规化的决策机构等等——往往不能够很好地解释相关问题（详见该书页3，以下引文或观点出自该书均只注明页码）。作者的这种研究取向得到 Perry 教授的认同。Perry 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对于那些习惯地认为精英决策是高度理性产物的人而言，金秋博士的叙述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震撼。这里我们很少发现‘手段’与‘目的’之间的清晰关联。作为替代，我们看到的是生理和心理的病变、无来由的恐惧和嫉妒、家庭不和、瞬间爆发的人际冲突和药物反应所导致的精神迷茫在‘文革’期间如何左右着精英们的行为。”

为了探究“林彪事件”的真相，金秋博士在书中系统回顾了革命时期的毛、林关系及其在“文革”期间的发展。她用大量的旁证材料说明：第一，作为毛泽东的长期追随者，林彪对毛泽东的政治忠诚是毋庸置疑的。这种政治忠诚和杰出的军事政治才干是林彪在党内军内得到迅速升迁的前提条件（页63—72）。第二，林彪对个人权力似乎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欲望。这部分源于淡泊的天性，部分源于健康的原因，部分源于对中国宫廷政治的透彻了解。对于被毛泽东选定为“接班人”，林彪感到的不是欣喜而是恐惧。“伴君如伴虎”的古训，使得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始终恪守“被动、被动、再被动”的信条（页78—80）。他虽然贵为“副统帅”，却很少过问政府和军队的工作。这不但与异常活跃、到处插手的“中央文革”成员形成鲜明的对照，也与忍辱负重、苦撑危局的周恩来形成鲜明的对照。“文革”期间发生的一些表面看来造成林彪个人权力扩张的事件，如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高层人事变动、1967年初的“三支两军”和反击“二月逆流”、1967年夏的“武汉事件”和1968年春的“杨余傅事件”等等，其实都出于毛泽东的乾纲独断。林彪在这些事件中的表现与其说是“趁火打劫”，毋宁说是“明哲保身”。第三，林彪对毛泽东的政治忠诚，并不意味着他对一些具体问题没有个人判断。正是基于社会稳定大局的考量，林彪积极支持“军委八条”的出台（页97）。正是出于对“中央文革”支持军内造反派挑起派性武斗的不满，林彪曾经与江青发生过正面冲突（页95）。正是出于对周恩来艰难处境的同情，林彪曾告诫其部下支持周的工作，而不要听信江青、康生等人的挑唆（页119）。

第四，“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官方公布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二、三）》，曾经对1970年夏天庐山会议上的“天才论”和“国家主席”之争大加渲染，以此作为指控林彪“阴谋篡党夺权”的论据。而金秋博士则含蓄地指出，毛泽东与林彪的政见分歧早在1969年春中共“九大”前夕已经初现端倪。如果说当时确实存在着一条所谓“林彪路线”的话，那么陈伯达根据林彪意见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应该是这条“路线”的具体表现。这个政治报告之所以遭到毛泽东的否决，是因为它批判了伯恩斯坦主义倾向，主张尽快结束“文革”动乱，把主要精力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页117—118）。



第五，以所谓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争来指控林彪，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政治伎俩。首先，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议是由修宪讨论引发的，就这个问题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原本是任何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其次，毛泽东几次通过汪东兴传达指示，并没有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而是在关键问题上含糊其辞，前后矛盾，其中玄机实在让人难以捉摸。第三，从庐山会议的讨论纪录看，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是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共同呼声。所以试图以此指控林彪“阴谋篡党夺权”，显然是无法令人信服的（页120—125）。毛泽东后来恼羞成怒，不但断然否决了这个提案，而且责令一大批支持这个提案的高级干部作“检查”。这除了充分表现出毛泽东的专横跋扈之外，不能说明其他任何问题。（至于毛泽东究竟出于何种考虑坚持不设国家主席，目前学界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解释。究竟哪一种解释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还有待相关史料的进一步公开。但在笔者看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毛泽东真的出于“伟大的谦虚”，那么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就应该对林彪的歌功颂德讲话提出严厉的批评。这样就不会有以后“红宝书”、“红海洋”、“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个人崇拜现象的泛滥恣肆，也不会有“令人讨厌”的“四个伟大”的疯狂炒作了。）

第六，我们不能否认“天才论”之争折射出当时党内高层内部的利益冲突和权力斗争。不过这场冲突和斗争的双方原本是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和以江青、张春桥为首的激进文人集团。而且这两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并不必然地影响到他们对毛泽东的政治忠诚。毛泽东出于意识形态和个人情感偏好，一屁股坐到激进文人集团一边，才使得这场争论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含义，使得林彪等人的言行带上了“犯上作乱”的意味。由此可见，庐山会议上的冲突是“九大”前夕毛、林政治分歧的一个意外结果。导致双方矛盾升级的关键原因不是林彪等人的政治野心，而是毛泽东对林彪等人的个人成见。正是出于对毛泽东无限上纲做法的严重不满，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不但自己拒绝检讨，而且指示其部下不要轻易做检讨（页126—130）。这进一步加深了毛、林之间的裂痕。此后毛泽东一方面向全党发出“三要三不要”的号召，另一方面则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倒林”三步曲——“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最终导致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

金秋博士的上述几点看法都得到国内知名“文革”研究专家的认同。王年一、何蜀和舒云等人近年来发表的不少论著，都是围绕上述几个主题展开的。我个人之所以特别欣赏金秋博士的观点，是因为她在书中精辟地概括了毛泽东开展党内斗争的四步曲模式，即第一，每次斗争总是始于毛泽东对某人的不喜欢、不信任。第二，初步的齟齬发生之后，毛泽东便开始利用各种场合向各级干部游说，努力营造一种反对某人的“共同意见”。第三，当毛泽东感到胜券在握之后，便召集会议开展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质言之就是调动各种党内力量对某人展开批判围攻，迫使某人承认错误。第四，一旦某人承认错误，毛泽东就会以全党的名义对他做出有罪判决，并以“组织反党小集团”的罪名将其清除出党（页5）。如果我们不纠缠于细节，而是从大处着眼，便不难发现金秋所描述的“林彪事件”与此前发生的反对彭德怀的斗争和反对刘少奇的斗争具有结构上的相似性。而“林彪事件”的独特之处在于，尽管毛泽东动用各种手段软硬兼施，林彪至死都没有作出像样的“自我批评”。这未免使得毛泽东清洗林彪的四步曲进行得不是那么地“完美”。

金秋博士不但在书中运用大量旁证材料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与官方说法截然不同的“林彪事件”，而且还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她并没有出于受害者的偏见对毛泽东加以妖魔化。她通过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回溯，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贡献，解释了毛泽东何以成为一个超凡魅力型领袖（页19—22）。不过她也客观地指出，这种个人超凡魅力的表象不仅误导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也误导了毛泽东自己。毛泽东的悲剧在于，他没有自觉地完成由一个“超凡魅力型领袖”向“法理型领袖”的转变。与此相关，他也没有领导全党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页22—23）。他的思想状态依然停留在革命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得已的美德”（Necessary Virtue，美国学者 Guy

Alitto 发明的一个概念，详见 Alitto 教授 2007 年 10 月 26 日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演讲 *Necessary Virtue: The Pragmatic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被他主观地泛化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社会道德标准。确保中共军队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行动战斗化，思想革命化，组织军事化，领导一元化”经验被他一成不变地移植到建国后的各项工作中（特别是经济建设工作和日常行政管理工作）。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以往的成就使得他坚信自己无所不能。结果，由他亲自发动和指挥的“大跃进”成为他个人政治生涯中的滑铁卢（页 28—30）。此后毛泽东一方面为了维护自己的乌托邦信仰，另一方面为了维护自己的超凡魅力神话，不知疲倦地展开了一轮又一轮党内斗争，直到他于 1976 年死去为止。

除了依据史实作出以上经验层面的叙述之外，金秋博士的独特贡献在于综合运用政治学和心理学的视角和方法，对毛泽东时代的“老人政治”现象进行了分析论述。她首先援引著名心理学家 Angus McIntyre 和 Yaacov Vertzberger 等人的研究成果，指出一般人在由青壮年期步入老年期后可能遭遇到的生理和心理病变，以及这些病变对人们判断能力和行为方式的影响。然后她将这一科学发现用于解释“大跃进”以后毛泽东的乖僻思想和行为（页 42—60）。我认为金秋博士的这种解释方法并非无稽之谈。既然我们承认毛泽东是一个凡人而不是一个“超人”，那么他就无法逃脱客观规律的制约。他晚年表现出的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猜忌多疑、自我中心、喜怒无常的确是老年偏执狂的典型症候。如果说“体制外因素”是通过体制性因素而发生影响的，那么当时中国政治的体制性问题在于没有办法摆脱这种病态的“老人政治”。所以从 1959 年夏天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开始，党内民主政治生活逐渐失范。毛泽东的个人意志成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谁要是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就会被以“反党”的罪名打倒。然而令毛泽东尴尬和恼怒的是，客观事实似乎并不因毛泽东的主观意志而改变。而且随着现实危机的不断加剧，党内总会不断有人出于全党利益的考虑流露出一些不同看法。由此刚愎自用的毛泽东便走进了一个愈挫愈勇的怪圈。越来越多的党内精英相继沦为“老年政治”的牺牲品。

在该书的结尾部分，金秋博士还依据间接证据和心理分析，很好地回答了一个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即为什么党内高层中许多人（包括刘少奇、林彪和周恩来等）早已意识到毛泽东的错误，却没有勇气公开地对毛泽东的错误加以抵制（更不要说试图取而代之了）？她认为这种现象根源于第一代革命者对毛泽东的个人忠诚，并进而指出这种“个人忠诚”是由以下五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第一是对毛泽东的尊重；第二是对毛泽东的畏惧；第三是自我认同的需要；第四是对共同事业的信仰；第五是既得利益的考量（页 203）。如果我们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比较熟悉的话，就不得不服膺金秋博士的洞见：“对毛泽东的尊重”基于毛泽东在革命期间的伟大功勋；“对毛泽东的畏惧”源于对延安整风以后历次党内政治斗争残酷性的深入了解；所谓“自我认同的需要”和“对共同事业的信仰”，是因为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已经由一个客观存在转化为一个符号象征，否定“毛泽东”便意味着否定“革命”，否定“革命”便意味着否定了那一代人终身为之而奋斗的事业及其个人的存在价值。至于第五点，就无须我在这里饶舌了。

综上所述，*The culture of power* 一书以“林彪事件”为中心，但是其内容涵盖远远超出具体事件本身。金秋博士致力的重点与其说是为林彪鸣冤叫屈，不如说是为了探究“林彪事件”为什么得以发生。该书对“林彪事件”具体过程的细致再现，客观上有助于我们了解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的本质和肌理。尽管金秋博士一再强调，该书着重探讨的是一些“体制外因素”，但是在我看来，遭到扭曲的体制性因素的影响作用依然清晰可见。

□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8 年 6 月号

~~~~~

【书刊介绍】

质疑成说 可圈可点  
——读史云、李丹慧新著《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

· 丁 东 ·

香港中文大学历时七年，组织了一套十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目前已经出版六卷。我读过其中的几卷之后，对史云、李丹慧所著的第八卷《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兴趣最大。本文略谈一些初步的感受。

《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叙述的是1972年到1976年中国大陆的历史。这几年，中国政层可谓波诡云谲、扑朔迷离。当时毛泽东已经处于人生的暮年，虽然大权在握，一言九鼎，但重病缠身，深居简出，甚至视力和语言表达也发生了障碍。他最大的焦虑就是选择接班人。在这四年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先后更换了周恩来、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四位。先后有可能进入毛泽东接班人选择视野的还有江青、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等人。在他和其他领导人之间沟通信息的有张玉凤、毛远新、王海容、唐闻生等人。此前出版的各种著作，对毛泽东选择接班人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官方的史著，往往谁在台上就突出宣传谁的合法性。华国锋当政，强调毛对华的信任。邓小平当政，又强调毛对邓的赏识。民间的史著曾有相反的观点，比如辛子陵认为毛的本意是传位于江青。由于官方档案解密程度太低，有些关键细节甚至没有留下文字档案，又由于网上、海外媒体上流传的某些文字貌似史料，实为小说家言，造成众说纷纭、真伪难辨、鱼目混珠的局面。

此书用相当大的篇幅叙述和考辨了毛泽东晚年选择接班人的相关问题，对周恩来、邓小平、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华国锋都有分析。对周，毛是既不满意，又不能不用。周死在毛之前，不成为问题。王洪文是“刘盆子”式的人物，毛曾经寄予厚望，试了试，扶不起来，毛放弃了。毛泽东不怀疑邓小平的能力，1975年的一段时间让他主持工作。他不肯出面操作肯定文革的历史决议，终于让毛失望。毛自认为一生办了两件大事，文革是其中之一。否定了文革，就否定了自己的一半。毛看出邓对文革有否定之意，临终前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让邓再次下台。毛泽东是否有意让江青接班，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肯定者的证据有哪一件令人信服。江青积怨甚多，高层人际关系太差，毛是十分清楚的。毛对她是恨铁不成钢。此书认为，“从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角度看，毛泽东最合适的接班人是张春桥。”（184页）类似的观点高文谦曾经表达过。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忠实传人的确是张春桥。书中颇有新意的一点，就是以相当篇幅，客观地说明张春桥虽然在历史上有问题，但不是叛徒和国民党特务，而且这些问题在文革前已经交代，并有组织结论。以今天的眼光看，作为十五岁的中学生，张春桥短暂地参加“华蒂社”，知道其有复兴社的背景又退出，确实不能算国民党特务。在上海，被与中央失去联系的中共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吸收为党员，更不能说明张春桥当时不想革命。林彪、康生、周恩来先后以张春桥的历史问题，阻止毛对张的信用，都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且也取得了成功——毛泽东最终没有把最高权力交给张春桥，但毛对张春桥一直怀有好感，并欣赏他的才干。此书提到，据张玉凤回忆：1976年“一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还有什么考虑？主席想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主席就又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委员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说是。就这样，主席提议华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毛远新出来对我说：幸亏他先去了（指周总理去世），主席自己把接班人选好了。这是大事。”（610页，作者引自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此书还提到：“天安门事件他（毛）坐卧不安，不断叫毛远新问情况。毛远新问他叫谁接班，他的意见是张春桥。毛远新说，张春桥太阴，不孚众望。毛泽东问毛远新的意见，毛远新说让华国锋接班比张春桥好。直到文革后毛远新在被关押中，还在表功，说华国锋当主席是他推荐的。”（658页）这个细节虽然新颖，但近日有熟人与毛远新核实，结论是并不准确。毛远新说自己

对华国锋不了解，否认自己当时曾经向毛泽东推荐华国锋为接班人。好在此书叙述这件事时的口气是“有人说”，并没有把这件事当作定论，而是当作一个有待考证的线索。我认为，在坚持文革路线上，毛泽东知道只有江青、张春桥才是死心塌地的自己人。但又担心让树敌过多的张春桥主持中央工作，就可能打破中央政治局当时已经十分脆弱的平衡格局，使十分紧张的政治格局变得更加紧张。于是只好选择一个既能在中央政治局为较多人接受，又能肯定文革的人来接班，华国锋就是这样被选中了。

当时的中央政治局主要由三派组成。第一派王、张、江、姚，是文革的急先锋。第二派是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这些老人，文革中受过不同程度的冲击，对文革有抵触。第三派是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这些人，他们没有参与文革的发动，但在文革中得到了提升。毛的如意算盘是让第一、三两派团结起来，共同掌权，巩固文革成果。书中提到“毛泽东感到在自己还能说话和头脑清醒时，需要有个交代。他两次交代当时在他身边值班的人华、王、张、汪和毛远新五个人要团结。”（663页）他在六月中旬还把以上五人和江青、姚文元、王海容叫到床前谈发动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和平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660页）毛泽东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在他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就由华国锋主导，第二、三两派联手行动，把第一派抓起来。而第二派又在数年之后，把第三派挤出政治舞台，否定了文革。

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叶剑英的态度很容易理解。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实际上也是批叶。汪东兴的态度也很容易理解，1970年的庐山会议，汪东兴已经跟着林彪向张春桥发难，为此做了检讨，后来由毛保他过了关。华国锋为什么要采用非常手段抓“四人帮”？最近熊蕾的文章提到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说，“叶帅认为，这个事情只有华国锋能这么干。周总理如果在世，干不出来，小平也干不出来。叶帅也没有想到有这么一下，也不敢想。”我想，这和江青在政治舞台上活动十年的所作所为有直接关系。江青依仗毛泽东夫人的特殊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想整谁就整谁，谁和她共事都没有安全感。她喜怒无常，盛气凌人，华国锋实在没法和她长期共事。张春桥内心认为华国锋鹊巢鸠占，取代了自己应有的位置，也不服气。华国锋与其在会议室里和他们当面发生不愉快，惹来没完没了的麻烦，不如采取非常手段，让他们从眼前彻底消失。他越是在资历和声望上不如周恩来和邓小平，越需要冒险采取非常手段。本书对这种非常手段的评价很有意思：“武力解决‘四人帮’的做法，在党内虽然不合程序，但文革中党内程序已经荡然无存。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林彪等，没有一个是召开正式会议决定的。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694页）

对于粉碎“四人帮”过程中各个领导人的作用，本书也作了认真的分析。作者认为按照重要性排队，应该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675页）就是说，华在叶前，汪在李前。对当时其他政治局成员的态度，也一一加以评析。上世纪八十年代，华国锋、汪东兴、吴德在政坛上失势，国内对于这段历史的评说相当走形。因为抓“四人帮”是功劳，所以只讲叶剑英、李先念的作用，而淡化华国锋和汪东兴的作用，吴德的作用几乎无人提及。只是在他去世后出版了口述回忆，细节才浮出水面。

武力解决“四人帮”迄今已经22年，双方的当事人华国锋、叶剑英和王、张、江、姚均已作古。在世的只有汪东兴了。从中央文件到一般的史著都说，是华、叶、汪抢在前面，粉碎了“四人帮”的武装政变计划。但此书却用一节的篇幅，梳理了已经公诸于世的相关史料，考证出这样的结论：“‘四人帮’在毛去世后这段时间里，并没有制定什么政变计划，也没有做什么发动政变的准备，更没有确定叶剑英所说的10月10日政变时间。他们当然有夺权的野心，但说想完全取代华国锋，尚为时过早。他们的活动，主要是给华和中央施加压力，维护和扩大他们自己的权力、地位。”（694页）我认为此书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宣传“四人帮”有政变计划，是为了占领舆论制高点，增强武力解决“四人帮”的政治合法性。政治斗

争的需要和史学研究的宗旨毕竟是两码事。时过境迁，现在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治史有不同的宗旨。有的追求集大成，有的追求填补空白，有的追求还原史实，有的追求反思成说，有的追求史学方法的创新。几个层面的工作都需要。大陆学者在言论和出版相对自由的香港出书，如果按照官方的历史结论框架，补充一些材料，做一些集大成的工作，其意义不可估计过高。而有意填补官方故意遮蔽的历史盲点，以扎实的考证挑战官方的不实结论者，则必须予以重视。虽然此书运用的史料、得出的结论尚有可商榷之处，但在填补空白和质疑成说方面，则可圈可点，令人刮目相看。研究中国的当代史、文革史，最需要提倡这样的胆识。

□ 原载《回忆》第六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